



《大家论学》

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蜀文献集成》

杨明照论文心雕龙

杨明照◎著

百年国学巅峰论坛珍藏版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蜀文献集成·大家论学》

杨明照论文心雕龙

杨明照◎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明照论文心雕龙/段渝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08.1

(书馆考究丛书.大家论学丛书)

ISBN 978-7-5439-3405-4

I. 杨… II. 段… III. 文心雕龙—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8298号

责任编辑:张树

特约编辑:李保平 刘亚

杨明照论文心雕龙

主编 段渝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9 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3405-4

定价:18.00元

<http://www.sstlp.com>



弁 言

李学勤*

日前听到《大家论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很快即将付印问世，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确实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作一推荐。

《大家论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见升温的当口诞生的。这几年，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期间，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作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究竟是继承而且创新的前提。

这里我们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终局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二十年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又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其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



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二十世纪。比之清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二十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二十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二十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重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大家论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



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博得欢迎。

这套《大家论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二十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萃，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二十世纪学者为主，为撰著系统的二十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了。

2007年12月17日

于北京清华园



杨明照先生评传

曹顺庆

—

1909年农历10月23日，杨明照先生出生于四川省大足县的一个“儒医”家庭。他的父亲既教私塾又行中医，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杨先生不到6岁，父亲就让他与二哥一起接受启蒙教育。所读之书品位都相当高，大多属于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先生生前每当回首这段往事时，心中都充满着感激和自豪，他说：“我在私塾呆过多年，能读会背，是养之有素的。”^①所以，日后对于记一些典籍、典故以及背诵《文心雕龙》，他都不觉得是什么难事。他对《文心雕龙》之熟悉甚至可以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后来，他在校注《刘子新论》和《抱朴子外篇》时也是从熟读本文开始的。由于对背诵的好处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杨先生在谈到他研究《文心雕龙》的体会时，第一条就是要熟读，熟读至倒背如流最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对上、下篇的理解，也才有较为全面、较为系统的可能。同时，对以后收集注释、校勘、考证诸方向的资料，也才有帮助。如果读得不熟，纵然碰到有关的资

^① 《我是怎样研究〈文心雕龙〉的》，《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料，很可能白白放过。另外，学习它的写作技巧和分析方法，也很有益处”。^① 受杨师的影响和启发，我后来都要求我的博士生们背诵古代文论的一些篇章，现已成为一种传统而传承下来。

1926年，杨先生开始走出私塾，接受新式教育。先是进大足县一年制的简易师范读一年，临毕业时，新建的县立初中开始招生。杨先生又幸运地考入。作为新式教育，其所开设的一些课程是私塾所没有的，比如自然科学、音乐、美术等课。就这样，先生读了许多新书，像谢无量的《中国六大文豪》等名著就是那个时候读的。这大大地开阔了先生的眼界。

1930年初中毕业后，先生又考入了重庆大学预科。正是这两年的预科教育奠定了先生以后的学术方向。在授课老师中给先生以最大影响的就是著名的《婉容词》作者吴芳吉。在先生读预科的第四个学期，他上《文学概论》课，讲课中经常板书《文心雕龙》原文，而且绘声绘色地讲得娓娓动听。先生心悦诚服，再加上被《文心雕龙》那秀辞丽句的骈文所吸引，从此就爱上了《文心雕龙》，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茶余饭后，总是拿着有黄叔琳注的扫叶山房石印本的《文心雕龙》浏览、讽诵。由于爱之笃、读之勤，未到暑期，全书就已背得很熟。由于对《文心雕龙》的兴趣与日俱增，所以放暑假的时候，杨先生又将新买的一本有黄注和李详补注的《文心雕龙》带回家研读。朝斯夕斯，口诵心惟，终于初得其门而入。发现黄、李两家注，颇有些未尽之处，尚待补正。尽管这时杨先生对于版本、目录、校勘，什么都不懂，完全是门外汉。但是先生个性强，胆子大，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没有向困难低头，知难而进。边学边干，边干边学，逐渐由不懂而懂得一些，由不熟悉而熟悉一些，于是，在阅读中

^① 《我是怎样研究〈文心雕龙〉的》，《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的所得也逐渐增多，先生就把它分条记录下来，清写成册，交一位老师斧正。这位老师阅后批道：“文中多所匡正，发前人所未发，大有可为！勉之，望之！”这是先生进行《文心雕龙》校注的第一次尝试，获得这样高的评价，大大地鼓舞了先生的学术信心。

1932年秋，杨先生升入国文系。由于课程相对较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较多，于是，杨先生就充分地利用这个时间来继续补正黄、李两家注，收获也日渐增多。就在这时，杨先生购得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本，叹其所注已经较详，无须强为操觚，再事补缀。但转念一想，既已投入了很多，就这样放弃实在有点可惜。于是，杨先生改变了策略，以范注为基础，以完善和补充范注之未足为目标，继续进行校注。在研阅范注的过程中，杨先生果然发现范注中有不少的疏漏和错误。不到二年，所用本子的眉端行间已几无空隙。期间，重庆大学于1935年秋，并入四川大学，先生也自然成为四川大学的学生。在川大，他继续钻研《文心雕龙》。到了1936年夏，他把将近四年以来所获得的成果整理成学士学位论文上交，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指导老师的好评：“校注颇为翔实，亦无近人喜异诡更之弊，足补黄、孙、李、黄诸家之遗。”在大学的四年中，杨先生在补校补注《文心雕龙》的同时，还从事《刘子》的校注工作，并写出了初稿。

就在大学毕业的这一年秋天，杨先生又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拜郭绍虞教授为师。当时的燕京大学名师云集，杨先生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聆听他们的课程，其中有顾颉刚先生的“春秋史”，闻一多先生的“诗经”，钱穆先生的“经学概论”和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学”等等。这些先生各有所长的治学方法给杨先生以很大的影响，他融会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研究院的第二、第三学年不再选课，杨先生在郭绍虞的指导下，继续以刘勰《文心雕龙》为题进

行深入的研究。他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丰富收藏，纵意渔猎，多方参稽，采掇到的新发现比过去任何时候所积累起来的都多。到1939年夏，杨先生把它们整理成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研究院申请答辩。后在答辩会上顺利获得通过，并议定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刊出。不意答辩时因触犯委员某公未得印行。先生只好藏之书篋中，以待沽之者。此外，在研究院学习期间，杨先生还积极撰写论文发表，计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1937年《文学年号》第3期）、《春秋左氏传君子曰征辞》（1937年《文学年号》第3期）、《说文采通人说考》（1937年《考古社刊》第6期）、《庄子校证》（1937年《燕京学报》第21期）、《九鼎考略》（1938年《文学年报》第4期）、《书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后》（1938年《燕京学报》第24期）、《太史公书著称史记考》（1939年《燕京学报》第26期）等。两年读书的丰硕科研成果足见先生的勤奋、专心和聪颖。

研究院毕业之后，杨先生留校任教，当助教。1941年至1942年，又到北平中国大学执教。1942年返蜀，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升任副教授。自1946年始，回四川大学任教，1950年升任教授。此后一直在川大工作。在建国前的十年间，杨先生先后开设的课程有“大一国文”、“文献知识”、“历代文选”、“六朝文”、“《昭明文选》”、“读书指导”、“《淮南子》”、“《文心雕龙》”等，写出了《刘子校注》、《抱朴子外篇校笺》两部专著的初稿，另外，还发表了《史通通释补》（1940年《文学年报》第6期）、《梁书刘勰传笺注》（1941年《文学年报》第7期）、《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1940年《燕京学报》第28期）、《抱朴子外篇举正》（1944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汉书颜注发覆》（1946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等。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真诚地向党靠近，认真做好教学和科



研工作，并于195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科研上先生继续沿着原来的古籍校注，尤其是《文心雕龙》的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在1958年下半年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全休在家也不停止。不过，这一年还是有一件值得先生高兴的事，那就是他1939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文心雕龙校注》，被上海古典文学社看中并出版。这是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书面世后很快脱销，除上海编辑所再版五次外，台北世界书局、河洛书局、香港龙门书局相继翻印或影印。而且还获得了同行的一致好评。日本著名汉学家户田浩晓认为《校注》中“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的见解”，堪称“自民国以来一直到战后《文心雕龙》研究的名著”。^①台湾学者王更生则认为该书“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断代”。^②上世纪80年代该书还被学界公认为与范文澜的注本同为《文心雕龙》注译本之基础。可以说该书奠定了杨先生在全国《文心雕龙》研究上的崇高地位。

从1959年起至1963年间，杨先生主要进行的是《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阐发以及规范学术的工作。发表的文章有《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文学思想》（1962年《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刘勰论作家的构思》（1962年《四川文学》第2期）、《四川治水神话中的夏禹》（195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重申必须重视引文和注明出处》（1961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57期）、《刘勰论创作过程中的炼意和炼辞》（1962年《四川文学》10期）、《汉魏六朝文学选本中几条注释的商榷》（1962年《光

^① 《杨明照氏〈文心雕龙校注〉读后》，见曹顺庆编《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② 《岁久弥新的“龙学”泰斗》，见《岁久弥光》，巴蜀书社，2001年。



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96期)等。但在写这些论文之余,杨先生还在继续思考《文心雕龙》的校注问题,他发现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尽管自己及以前的王惟俭、梅庆生、黄叔琳、李讷、范文澜诸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部流传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名著,在辗转抄、刻的过程中,所衍生的各式各样的谬误:或脱简、或漏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尚未扫净,仍有疑滞费解及待增补者,需要继续钻研抉择和再事校勘。于是,杨先生此时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安静而无任何干扰的小天地,来完成自己的这一设想。

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杨先生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分去扫马路、冲厕所,后被赶出学校,下放到乡里。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人无法驾驭自己只好随波逐流;有的人则失去了人身自由,学术的权利被剥夺了。杨先生相对来说还算幸运,学术虽然不能明搞,但还可以悄悄地搞。面对那纷杂动乱的形势和不公正的待遇,杨先生以一种心远地自偏的态度待之,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打理旧业,搞搞科研,我行我素。每天应付完反对派分派的“工作”回家后,就把房门紧闭,将过去收集的资料和各种版本翻检出来,摊在一张大床上,继续进行《文心雕龙校注》的补订工作。为防意外,他准备了一张草席,如有不速之客敲门,就立刻打开那张草席,将床上的“违禁物”——书籍和资料盖上,然后徐步出来应付。起初是重温六朝典籍和唐宋类书,随后则增订《梁书刘勰传笺注》、《校注拾遗》和分类补充《附录》。循序渐进,乐在其中。虽严寒酷暑,亦未中断。结果收获颇丰:久已荒疏的典籍,又熟悉些了;多年辑存的有关资料,得以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了。写成的初稿,与1958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校注》本相较,其中的《梁书刘勰传笺注》部分换补了二分之一;《校注拾遗》部分增加了五分之二;《附录》部分则扩充得更多,由原来的六类蕃衍为九类;《引用书目》部分达六



百八十余种，几乎多了两倍。“文革”十年，有多少人浪费了光阴，荒废了专业。而杨先生面对这种“灾难”却能反其道而用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能不说是当时少有的特例之一。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年近70岁的杨先生，又开始了《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初稿的修改和增补工作。初稿虽已经完成，但他深恐因识见有限，而有所遗漏。于是，专程到北京、上海、南京三处图书馆查阅未见之书，参校未见之本。弋钓归来，便又对初稿重新作了修改和增补，使之更臻详瞻。

这部书1980年夏终于完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引起了海内外“龙学”界的重视。上海《古籍书讯》、香港《大公报》都撰专文评价；台北崧高书社则擅自翻印。在进行增补校注的同时，杨先生还陆续发表了各种论文：《刘勰卒年初探》（1978年《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文心雕龙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1978年《文史》第5期）、《刘勰灭惑论撰年考》（1979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1980年《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文心雕龙时序篇“皇齐”解》（1981年《文学遗产》第4期）等8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在80年代的后期，先生还发表了《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史、论、评结合的民族特色》（1985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十辑）、《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1986年《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等产生良好影响的论文。出版了40万字的《学不已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和《刘子校注》（巴蜀书社1987年版）。这段时间先生可谓硕果累累，这是长期压抑之后的学术喷发，是先生的又一个学术青春的焕发。而在这期间先生还承担着其他的行政和社会活动的事务，并遭受两次患病、两次动手术的不幸呢。1979年，先生出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承担着指导研究生的任务，并成

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首批博士生导师。此外，还担任了不少的学术团体的领导，历任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全国《昭明文选》学会顾问、全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全国苏轼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文艺理论学会会长、省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成都市文联主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顾问、《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等。

进入 90 年代，杨先生已经 80 高龄，但他还是继续发扬“学不已”的精神，坚持搞自己的科研，不仅撰写了《文心雕龙版本经眼录》等多篇学术论文，而且还完成并出版了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这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约 82 万字的巨著《抱朴子外篇校笺》。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 639 页，1991 年 12 月出版（1996 年又再版），下册 806 页，1998 年 3 月出版。这部巨著被誉为“皇皇巨献，真可谓千秋大业，万世宏功”！^①它是杨先生半生心血的结晶。先生自 1940 年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当助教时，就开始从事《抱朴子外篇》的校注工作，到 1989 年 10 月定稿时已年 80 矣，1997 年 7 月再校，则已年 88 岁矣。历时之长，用心之专，真让人叹为观止。这部书被列为新编《诸子集成》的重点著作之一。《抱朴子外篇》是东晋葛洪的一部杰出的子论，与其《内篇》谈道家的神仙内容不同，《外篇》是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它对社会和文学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在我国文化宝库里是一份珍贵遗产。但一千六百年来，一直乏人注释，而其所使用的韵语、典故，文字的讹误衍夺很多，致令读者有望书兴叹之苦。于是，杨先生早年就立下了探颐索隐，疏通证明的决心。为了达成参互考校，匡谬补缺的目的，杨先生广泛搜集各种版本，名人批

^① 王更生：《杨明照和他的〈抱朴子外篇校笺〉》，见《岁久弥光》，巴蜀书社，2001 年，第 130 页。



校本以及前辈、近人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历时之长也就不可避免。先生对各种材料兼收并蓄，并为之校文字、通句读、补阙遗。这不仅使原本艰涩难读的《抱朴子外篇》，晦而复明，怡然理顺，而且他以“依经立义”的方式所增加的论述也很丰富，比如关于葛洪家世的部分，做得相当的充实完备。所以，台湾学者王更生教授说杨先生注中的此类工作，“等于替葛洪和他的《抱朴子外篇》做了一部完整的记录”。^①

到了晚年，杨先生还是工作不断，他着手把以前所出的《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以及新发现的新材料、新见解汇集成《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交由中华书局出版。还应江苏出版社之约，撰写20多万字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对原已出的《刘子校注》重新整理、补充成《刘子新笺》。这些工作的完成，了却了先生多为中国传统文化留点东西的夙愿。这既是先生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文化的幸事。先生之功绩将随着这些著作的流传而被后人所永远铭记。

二

综观杨先生整个人生和学术历程，其学术上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龙》。先生也正是凭借这方面的成就而被誉为“龙学泰斗”的。无论在资料的搜集、文本的校勘，还是理论研究上，他都能独树一帜。

从校注方面看，先生的成果先后有：《文心雕龙校注》（1958年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82年版）、《增订文心

^① 王更生：《杨明照和他的〈抱朴子外篇校笺〉》，见《岁久弥光》，巴蜀书社，2001年，第132页。



雕龙校注》(集大成本, 2000年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2001年版)。他的校注以准确、材料详赡、说服力强而为人所称道。其成就大大地超越了范文澜注。范文澜注是以与黄叔琳注相关的本子为底本, 参校众本而成, 并因而能超胜一筹, 取代黄注而成为社会上较有权威的注本。梁启超为此而称赞道:“其征证该核, 考据精审, 于训诂义理, 皆多所发明, 荟萃通人之说而折中之, 使义无不明, 句无不违。”^① 杨先生最初读范注的时候也曾叹为观止, 并差点放弃自己业已开始的校注工作, 但后来觉得放弃实在可惜, 就凭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劲在范注的基础上继续钻研, 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并进而认识到范注并非无可挑剔。1937年先生发表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一文, 举正了范注37条, 1939年做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研究》又举出了44条。综合前面的成果, 杨先生1958年出版了《文心雕龙校注》, 奠定了自己在文心雕龙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和对范注的初步超越。到1982年杨先生又积40多年的研究成果, 出版了《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全面地超越了范注。1988年杨先生又发表了《〈文心雕龙〉有重注必要》一文指出范注尽管自30年代被社会上公认为权威版本, 但由于其成书时间较早, 网罗未周, 好些资料没有见到; 另外, 对文字的是正, 词句的考索, 也有所不足。新中国成立前, 国内外虽曾有专文举正, 而范《注》也一再翻版, 却未见征引。书中的某些谬误, 至今仍在相承沿用, 以讹传讹。为此, 杨先生还把范注的不周之处概括为20个方面: (一) 是底本不佳。范注声称依据的是黄叔琳注本, 但实际上却是《四部备要本》。(二) 是断句欠妥。如《时序》篇“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十二字, 乃紧接上文“有虞继作, 政阜比暇, ‘薰风’诗于元后, ‘烂云’歌于列臣”四句的赞美之辞。应于

^① 转引《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 第4—5页。